

知识分子的“自审”姿态与意识

——杨绛《干校六记》小识

刘珊珊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要:确立从作者的“自审”角度来解读作品,是源于笔者认为杨绛在干校中当时的生活状态,同回京八年后通过回忆来记录的状态,虽在叙述事实上不存在太大差异但在情感上会有一些的变化。如,社会生活的变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自我生活状态的变化,人生经验的变化,知识心理构成等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即使这些影响是细微的,但笔者认为不应该忽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来寻找这种差异。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弥漫着关于反思、自审、忏悔、伤痕这些命题的文学环境下,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作家们都会将这一人生经历用这些情感来消化。而杨绛的家庭环境、知识构成、人生阅历则将她的这一遭遇淡化,而且不断在从自身找原因,从而确立了她从知识分子“自审”角度展开。

关键词:杨绛;干校六记;自审;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3)04-0107-03

《干校六记》在国内发表后,在当时的散文界并没有受到足够注意,因为较之于其他描写“文革”的作品,《干校六记》少了控诉、血泪和“伤痕”,记录的也只是生活琐事,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但随后这篇散文又盛极一时,其原因不仅是在伤痕、反思情绪弥漫之际,杨绛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平淡隐忍叙述的方式显得与众不同,更因为挽悼散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受到人们推崇从而在新时期散文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张炯主持编著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列出了 1978—1983 年全国颁发的几项主要文学奖项分别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奖、首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新诗奖。诸多奖项中唯独没有散文这一体裁的身影。尽管如此,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具有丰富人文关怀和思想智慧的出版社,如,三联书店并没有放弃散文的创作以及出版发行。如此,在新时期就有了“以挽悼之作为发端的散文的繁荣”^[1]。如果说新时期散文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泪水孕育而成的话,杨绛却以“一种走出了自我幻觉、选择了适情任性的自然、平凡人生的知识分子的姿态”来审视这段人生经历,从而构成了散

文《干校六记》独特的思想艺术特性。

—

杨绛的“自审”姿态与意识表现在作家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反省和审视,并能走出“知识分子”的创作姿态和身份意识的藩篱。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认定,洪子诚在《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中提到,一个是“实体概念”即指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从事“脑力劳动”;一个是“功能概念”,指那些有更广阔视野,关心社会问题与命运,并进而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者^[2]。毫无疑问,杨绛首先认定了自己“实体概念”上的身份,她在《下放别记》中就有明显的身份意识:“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但是,当“知识分子”的“功能”无法在“实体”上发挥作用时,即他们在自认为应该坚持的社会责任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上出现阙失时,就会出现“自审”和反省。《凿井记劳》中有这样的描写:“我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出了打酒的窍门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

收稿日期:2013-07-22

作者简介:刘珊珊(1986-),女,湖北当阳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枯骨。瓶里还剩有一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下放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不乏高级知识分子,谁人不能判断出厨房里贴有毒标志的瓶子是酒瓶而不是药瓶呢?打酒瓶上的剧毒标志似乎只是起到了“防小人,难防君子”的作用。下放到当地干校的知识分子们便成了他们眼中的该防的对象。这就生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劳动人民、老百姓眼中知识分子身份的不透明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杨绛意识到问题所在,并试图去解决问题:“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知识分子固有的“启蒙者”立场被摧毁,实则是对知识分子“功能概念”的遮蔽,不得已只能具有“实体概念”上的身份,并试图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淡化这种身份意识从而平衡知识分子功能作用的退化。“自我的取笑”不仅指当时自己产生的知识分子“实体”和“功能”两者之间的矛盾意识,在作品中呈现的还有当下作者创作过程中“自审”的心理状态,在情感上更能削弱文革后知识分子成为受害者、弱者,值得同情的观念,也找回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责任,似乎暗示了自己找到了解决矛盾的途径。

“我每天跟随同伙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3]这段话也能补充说明杨绛当时意识的某种变化,但文中大量的引号附加在对身份界定和某种意识感觉上,不免造成了作者在当下创作中与当时的某种情感和意识的疏离,这也是作者重新审视自我后情感微妙变化的结果。

二

杨绛的“自审”更多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功能概念: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负有使命

的,以启蒙者自居的人。杨绛也担负着这一社会责任。其早期创造的小说《璐璐,不用愁》中刻画了一个爱慕虚荣、思想浅薄、游移不定的青年女性,虽是对小说的最初尝试,但对人性的探索真实细腻,对女性世界观的引导也颇为大胆。在干校中的杨绛也一直有着对现实中悲悯情怀人性的坚守和强烈的责任感,如,对于亲人、同事、百姓,甚至包括牲畜(原文不在此引述)。

杨绛的这些文字,还包括《“小趋”记情》整整一段文字是她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加以女性的细腻情怀抒写的,这里面包含着亲情、友情和爱情,当然,还有穿上了“阶级外衣”的一种情感。杨绛在《学圃记闲》中这样写道:“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象桃儿,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好!大的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我不和她争,只等她拣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她两把小的。她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时不敢随便送人,也不能开这个例。”^{[3]11}这段文字有作者对老大娘歉疚之心的情感态度表露,但由于对干校制度规定心存敬畏,“不敢开先例”浪费了这堆稍大的疙瘩菜,而这堆疙瘩菜本应该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弥补“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滋味,其更多的是当前对当时胆怯心理进行的反省。同时,杨绛为她当时察觉到老大娘“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而产生的心知肚明却又故意不挑明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而愧疚,这种愧疚在作者毫不掩饰的自我披露下变成了一种温情和关怀。知识分子“能利用他们具有的知识经验,和对历史的了解,来探索问题的解决从而能够发挥作用,指出出路。”^[4]杨绛试图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杨绛将更多的笔力倾注在比阶级关系更长久,更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所谓的“人之常情”如夫妻、同事、子女、家畜上。

三

杨绛在作品中体现的超然态度,把自己似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上,而后又以旁观者清的态度进行自我剖析,由此,便确立了杨绛“自审”的基点和尺度。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在“文人英雄”意识下

对内心拷问式的忏悔和自审。正如杨绛读《堂吉诃德》后所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不是英雄,我不需要拯救世界”。作者正是以这样一种自审姿态和意识成就了《干校六记》的“举重若轻,超凡宁静”。这部作品更可以视为杨绛日后创作姿态和自我意识的一个转折,正如她在《将饮茶》中写道:“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

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5]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304.
- [2] 洪子诚. 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6.
- [3] 杨绛. 干校六记[M]. 北京:三联书店,2010:8.
- [4] 洪子诚.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2:221.
- [5] 杨绛. 将饮茶[M]. 北京:三联书店,2010:50-51.

: ; 1 78&2&. 1 2'. #'\$%)*\$(% 1%\$+ D&=1)&2%" 31=-1F2 *' 2*\$' "

——Understanding of Yang Jiang's *Six Chapters of Life in a Cadre School*

LIU Shan-shan

(Chong 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 Qing 401331, China)

78&2&. To interpret the book *Six Chapters of Life in a Cadre School* from the "self-examination" point of view is based on the opinion that Yang Jiang's life in the cadre school is mostly recorded by her memory when she has been back to Beijing eight years after. Ther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in accounting, however, certain changes in emotions still exist. Many factors such as changes of social life, changes of historical context, changes of self life status, changes of life experience, knowledge constitution, psychology and so on can affect writing. Even if these effects are subtle, they can 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e difference through text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early 1980s, the literature environment is filled with propositions of reflection, self-examination, repentance and scars. The writers who has lived through the culture reolution would like to digest their life experience with these emotions. Similarly, Yang Jiang's family background knowledge constitution, life experience fad what she had suffered, and make her self-examine constantly. Thus the angle of her intellectual self-examination is determined.

814 9\$. % Yang Jiang; *Six Chapters of Life in a Cadre School*; self-examination; prose

[责任编辑 陈希红]